

吴义勤 主编

景观、镜像 与记忆：

『新世纪』文化掠影与思考
李祖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义勤 主编

景观、镜像与记忆：

『新世纪』文化掠影与思考

李祖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观、镜像与记忆：“新世纪”文化掠影与思考/

李祖德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地火文学批评丛书）

ISBN 978-7-208-15696-8

I. ①景…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1815 号

责任编辑 屠毅力

封面设计 张志全工作室

地火文学批评丛书

景观、镜像与记忆：“新世纪”文化掠影与思考

李祖德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43,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696-8/I·1804

定 价 48.00 元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
《野草·题辞》

地火奔突 批评问道

——序“地火文学批评丛书”

吴义勤

文学批评作为专门的学科是现代教育体制的产物。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 / 文学史 / 文学批评三分法既是对西方学术的准确概括，又把这种划分传递到中国。如今有无数专业研究者从事着文学批评工作，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知识生产具有深厚的学科支撑。文学现场源源不断的新作需要文学批评的阐释，层出不穷的文学现象需要文学批评去辨认，文学史的准入门槛需要文学批评去建构和创设……因此，文学批评从来不缺热闹，甚至，文学批评的问题就在于太过热闹。

近年来，对文学批评的反思与诟病不绝于耳。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不同的反思：忧心于批评的独立性、公正性而有对“红包”批评的发难；忧心于批评的及物性和同时代性而有对学院化批评的针砭；忧心于批评的专业性而有对泡沫化媒体批评的炮轰；忧心于批评标准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有对“棒杀”和“捧杀”批评的深恶痛绝。这些不同的反思之间甚至是相互抵触的，从事纯学院文学批评的人关心的是文学批评的精深渊博以及在学术谱系中的突破，这个谱系由于很难被非专业读者共享而常被视为艰深晦涩，因此反对批评的过度学院化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反过来，受过专业训练，把客观公允、准确自洽作为批评标准的批评者能轻易发现当下很多批评，或自说自话，没有参照，无限放大；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不同需要能引申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只能说明任何批评类型都有其限度。

批评的乱象呼唤有效的批评伦理，显然，这种伦理恐怕不是以某种

类型为旨归，不是定于一尊，而是在批评场域中确立一种有益的生态。除了抄袭、谩骂等明显有违文学批评的道德及专业伦理的做法外，作为类型的争执，不妨且看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事文学批评者也不妨多一点平常心，无论是习惯于肯定性的批评，还是善做否定性的批评，无论是何种批评风格，文学观点和判断本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更不存在审美和道德上的高低之分，“剜烂苹果”这样直接、实证的文本批评有精深学院批评所不及处，但优秀学院批评的宏阔视野也不该被轻慢。

提倡批评生态的包容多元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批评立场。何谓文学批评，教科书提供的是一般化定义，但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个人风格化的。所以，从事文学批评者不仅要追问何谓文学批评，更要追问何谓有效的文学批评，何谓好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必须要有幽微曲折的审美之心，也要有精深宏阔的历史之眼，前者帮助批评家不要遗漏了作家的体验，后者帮助批评家为这种体验找到合适的历史位置。能如此，便不失为称职的批评家。可是，更好的批评家，还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个人风格；更更好的批评家，他的写作不仅阐释作品，阐释自己，也在时间的迷雾笼罩的巨石荒野中寻路，并用创造性的批评照亮了人类精神的某条分岔小径。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我相信在中国文学批评场域，也有这种问道的力量在“地下运行”，它奔突着，吸纳着，要去寻找那条精神的该往之路！主编这套“地火文学批评丛书”，与其说是已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力量，不如说是呼吁这样一种于边缘问道的批评！

是为序！

目 录

地火奔突 批评问道

——序“地火文学批评丛书” 吴义勤 001

第一辑 记忆、“新人民性”及其可能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

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003

文学性、人性与“新人民性”之可能：

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二 018

现代性的地方经验与文学的人民伦理：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诗学问题、历史语境与意识结构 032

小说、战争与历史：

抗战小说中的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 051

生命启示录、历史记忆与美学结构：

长征及“长征文艺”略论 066

苦难叙述、国族认同与“新人民性”：

2008年“地震诗歌”启示录 074

第二辑 景观、镜像与掠影

“非虚构”的踪迹、可能性与问题 087

记忆以及记忆的承诺：

读短篇小说集《再见，牛魔王》 100

乡愁书写与大地无意识：

读长篇小说《还魂记》 112

时间、人以及失衡的对称：

读中篇小说《母亲在左，我在右》 124

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

史铁生及其“苦难”诗学片论 130

论新世纪诗歌的“第三条道路”：

延及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些问题 145

《钢的琴》与我们的时代 160

第三辑 阅读、思考与批评

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悖论结构：

“现代性”问题阅读与思考札记 171

反思现代性与重构穆旦：

读《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 186

如何理解中国与阐释中国：	
张颐武思想文化批评述略	195
知识、知识分子及其公共性：	
“知识”与“知识分子”阅读札记	205
妇女、历史想象与现代国家：	
读《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214
无条件的爱和爱的条件：	
读埃里克·弗洛姆《爱的艺术》	219
苏格拉底之“道”与现代生活：	
读罗纳德·格罗斯《苏格拉底之道》	224
权力技术以及娱乐的政治：	
《娱乐至死》以及“权力”的阅读札记	228

第四辑 言语、形式与经验

新诗之“变常”与诗学题域转换	237
地域经验中的诗性言说：	
诗集《光芒与蝶》中的繁复体验	246
形式、意蕴与音乐性：	
《再别康桥》音乐性新探	254
理性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内面”：	
重读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及其“现代性”	262

第一辑 记忆、“新人民性”及其可能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 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主体性”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建构民族国家和寻求现代性的进程。这一问题有如草蛇灰线般地隐伏于各种话语或概念，诸如“国民”“国民性”“人民”“人民性”“工农兵”“社会主义新人”“人”等。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人民性”绝不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中的一个理论话语或概念，更是一种在“文学—国家”主体性“互文”建构中与之相契合的观念、愿望与想象。从“国民性”到“人民性”，从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到国家论述，可以勾勒出中国新文学的主体想象和主体性建构的话语与意义踪迹。

一、“人民性”与民族国家现代性

在现代性(modernity)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论视域中，20世纪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被嵌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中国)建构的历史工程之中，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亦是近现代中国寻求和应对现代性的诸种方案之一。正如有论者所说，“就其基本特质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①在这一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原初的、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为一个未来“现代中国”的降临建构或想象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概括地说，这也

① 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民族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2期。

就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早期启蒙主义思潮所聚焦的“国民”与“国民性”问题。进而言之，要建构这样一个现代的“群”——民族国家，就“因此产生了的‘群’的知识，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产生了有关‘公德’和‘公性情’的讨论。由于民族主义话语的规划，20世纪初形成了‘国民性’的知识讨论。”^①正是因为晚清以降的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巨变和全新的观念、知识的建构，这也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根本性的话语与思想场域。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现代“中国人”“国民”“国民性”的主体想象表征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书写欲望和集体无意识。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与“群治”之说，还是鲁迅对于“农民”“国民性”及“国民劣根性”的叙事，还是沈从文对于古旧中国乡村及其道德与文化理想的怀旧书写，甚至也包括赵树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与日常生活及伦理变迁的呈现，这些“故事”“能指”或知识论述都可理解为这一深层欲望（焦虑）与无意识的文化/文学表征。但历史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导致了“国民”或“国民性”这一观念及其意指的变化和延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中，这一“想象—意指”结构发生了潜在而深刻的衍变。

在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建制之初，周扬曾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

^①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①周扬在此有意识地提及到了“新的国民性”，或许他意在将当代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建立起某种精神联系，从而为新中国文艺的创制寻找历史的资源和历史（新/现代文学史）的合法性，但在新的历史情势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中，“国民性”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完全与新的历史视野相叠合，也渐渐失去了它最初的历史愿望和叙事效能。或者说，要与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现实经验与视界相“融合”，需要新的中心话语和理论概念。于是，“人民性”，而不是“国民性”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新的主体想象。

从理论话语本身来看，“国民”“国民性”想象所投射的“民族国家”形象乃是近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关于“世界”的重新筹划，一种新的关于“历史/时间”、“地理/空间”的规划，这乃是所谓的“现代性”——现时代的人们对于自我、群体、他者及世界的新的感知、知识与观念，当然也是近现代世界的现实情境。“民族国家”因此而成为一种新的关于“世界/他者”与“民族/自我”的想象、一种新的关于“群”（民族、国家）的普遍性知识。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所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②

对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来说，面临外部强势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冲击，以及自我的、内在的“王朝/天下”想象崩解的焦虑，建构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便成为拯救自我的“历史”以进入资本主义所规划的“现代世界”的唯一途径。“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迅速地发展了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按王朝纪年来划分历史，而忽略国民的历史。他的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5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甘阳译：《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2页。

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以致他使用区域性的比喻把线性的分期比做是民族国家之间用以标志各自辖区的条约。”^①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便萌生了这样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知识与观念，尽管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仍然对自我的“历史”与“文明”心怀眷恋，但正如列文森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中说的那样，由于“历史与价值的撕裂”^②，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巨变时期中国的想象终究无可逃脱地被他者化，被迫陷入“民族国家”话语与想象的知识/认识范型。亦如列文森所阐明的那样，由于儒家文化秩序的断裂，“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③。由此，“国民”“国民性”，而不是“人民”，当然更非传统的“臣民”或“子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叙事的深层欲望（焦虑）与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一个新生的现实的政治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人民共和国”也已脱离了早前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新中国”的想象，“国民”与“国民性”话语已不能满足于建构新的国家和国家主体之需。从理论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因为它并不是以“民族/国民”（nation）为主体的，也不完全是以政党和上层官僚系统为主体的“党国”（party-state），而是以带有特定阶级属性和阶级意识的“人民”为主体想象的“人民国家”（people-state）。它在中国当代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通常被具体表述为“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5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中，亦已开始将“民

① [美]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② 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

③ [美] 约瑟夫·R·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族”这一想象逐渐转换为“人民”想象，从而将不乏冲突和歧义的“民族”话语想象并整合成一个新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同体，由此建构了内涵有异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国家想象和国家形象。

同时，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而言，“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人民。”^①因此，“人民”与“人民性”成为新的国家论述和文学话语。就文学的“人民性”概念本身及来源而言，这一概念较早见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如普希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关于俄罗斯文学品格的论述。这与早期俄罗斯文学的本土化、民族化、现实性诉求有关，尤其是在别林斯基的论述中，“人民性”不只是带有“阶级/底层”的倾向，更带有“民族”（包括有教养的阶层）的意涵，是否具有“人民性”关键在于是否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性”。^②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人民”和“人民性”带有“阶级/阶层”的倾向是毋庸置疑的，陈晓明认为，“在漫长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人民性是一个与‘党性’相互置换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也同样如此。在正统的文艺学论著中，尽管也给予人民性更宽泛的含义，但其本质还是定位在‘党性’支配着人民性的内涵。”^③因此，“人民”及“人民性”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更具有复杂的意涵，它们既是一个带有阶级/阶层色彩与政治含义的主体性概念和文学观念，也是一个关涉到对新政权、新国家的合法性来源的总叙事，同时也关涉到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主体的想象与建构。

“作为民族主权的基础，人民很古老，可是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同样，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

①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② 参见[俄] 别林斯基著，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

③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人民的教育学不仅是民族国家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是知识分子的任务。”^①虽然杜赞奇仍然是在“民族国家”这一资本主义启蒙现代性的视野中来谈论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人民”的，但其论述也表明：新的现实政治条件、知识话语和文学建制需要新的主体想象，沉睡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民”必须经过“询唤”和重塑，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带有阶级意涵的“人民”）。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正是这样的一门“人民的教育学”，由此展开关于“人民”“人民性”的话语建构，并试图界定其想象与叙事的范围。

二、“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独特构想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中，尤其在文艺指导思想和文艺政策层面上，诸如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界领导人讲话、作协和文联等文艺部门的政策方针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等带有政策性和指导性的文本中，都存在着大量关于文学“人民性”的论述。这些论述既可能是针对文学创作的，也可能是针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相关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之间还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甚至还隐含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但在总体上形成了建构“人民”“人民性”话语的一种指导性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这一核心话语的确立及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这一经典文本中。这一文本也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建制的蓝本和依据。这一文本和毛泽东早期的一些文本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新民主主义论》（1940）等也有着较直接的思想关联，可以说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文本”

① [美]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 页。